

傅璇琮 主编

新編
唐五代文學編年史

〔初盛唐卷〕

陶敏
傅璇琮 著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辽海出版社

◎ 卷之二 古今中外學術研究

◎ 卷之二 古今中外學術研究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傅璇琮 主编

新編
唐五代文學編年史

〔初盛唐卷〕

陶敏
傅璇琮 著



辽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编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傅璇琮等著. —沈阳: 辽海出版社, 2012. 12

ISBN 978-7-5451-2298-5

I. ①新… II. ①傅… III. ①中国文学—古代文学史—编年史—唐代
②中国文学—古代文学史—编年史—五代 (907~960) IV. ①I209.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82894 号

责任编辑: 于景祥 徐桂秋 范高强

封面设计: 浩鸣设计

版式设计: 王钦民

责任校对: 郭 醒

出 版 者: 辽海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9 号

邮 编: 110003

电 话: 024-23284460

E-mail: dszbs@mail.lnpgc.com.cn

http://www.lhph.com.cn

印 刷 者: 辽宁星海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发 行 者: 辽海出版社

幅面尺寸: 170mm × 240mm

印 张: 159

字 数: 3000 千字

出版时间: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58.00 元 (全四册)

序

程千帆

不久前，畏友傅璇琮先生来信，告知其与陶敏、李一飞、吴在庆、贾晋华四位学侣历时多年惨淡经营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不久将定稿付印，希望我能写一篇序。

我自五十年代中期由北京大学浦江清先生介绍和傅先生订交，其间虽然经过“扩大化”与“史无前例”，踪迹曾有离合，但求道问学大体相同，近二十年切磋更密。现在傅先生既然有此美意，我虽近年耳全聋，目半盲，而思维尚无大损，因而也就不敢推辞。谨就所知，略陈所见。

即使是对现代中国学术动态不十分留意的人，也不会忽略傅先生的学术活动，特别是他在唐代文学研究方面的活动和成就。总体说来，在本世纪最后三十年中，傅先生所取得的成绩是卓著的，影响也是非常巨大的。从他的实践来看，几十年中，他是在不知疲倦地有目的地追求。他的追求看来很明确，用成语来说，就是《孟子》所说的“善与人同”，《荀子》所说的“学不可以已”，《礼记》所说的“在止于至善”。

《孟子·公孙丑上篇》：“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这位好辩的邹人当日和门徒讨论，提出这一命题，当然是属于伦理的、道德的范畴。但对善于用古、善于通变的傅先生来说，却探骊得珠地使之成为能发挥集体力量、提高成果质量的有效工作手段。我们看到傅先生在这方面取得的最早成果是《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此作收书八十余种，书中载有唐五代近三万人的传

记资料，由同在中华书局工作的张忱石、许逸民两先生和傅先生共同编成，为唐五代人物现存资料的检索，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无论就三位编者来说，还是就千万使用此书者来说，这都是“善与人同”。他们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可以想象，如果历代史料都能编出这种索引，学术的发展当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此书受到学术界的欢迎，也鼓励傅先生更积极地从事这类极有意义的集体工作，于是就有了《唐才子传校笺》的出现。这部集二十余位专家的精力，历时十年左右才完成的集体著作，使几百位唐五代诗人的生平事迹获得了空前细密准确地清理，也使唐五代文学的研究随之而提高到一个空前的水平。

这种工作方式不但效率高，而且有益于形成良好的学风，达到“乐取于人以为善”的作用，所以傅先生也乐于运用。于是在《唐才子传校笺》获得成功之后，又有《唐五代文学编年史》的尝试。

《荀子·劝学篇》以“学不可以已”这么一句极其斩截简单的话，概括了治学的要点。假如将其翻译成现代汉语，也许可以说是“做学问应当走不断持续发展的道路”。从傅先生几十年在学术上的追求看来，他正是在这么做，并且取得了辉煌的业绩。一般地说，学术研究属于理性思维，它基本上是带有功利性质的思考。但它并不排斥其中具有感情色彩。我至今记得亡室沈祖棻说过的一句话：“只是在无可奈何之境，万不得已之情中，才有好诗。”其实，创作冲动并不限于艺术作品，研究工作，真诚的研究工作，其中往往含有使人非研究不可的那种“不得已”的感情。这就使学者们，从事艰苦探索的人们产生一种使命感和勇气，一种非好好地完成决不甘休的信心。

我读傅先生的著作，无论是专书或单篇论文，也无论是文献考订或艺术评论，都有一种《荀子》所说的“不可以已”和《孟子》所说的“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的感觉。正因为如此，傅先生才在命题上敢于攻坚，在学术是非上，敢于提出新见。他写于本世纪80年代前期的《唐代科举与文学》和《李德裕年谱》两部专著，都表现了这种“不可以已”和“不得已”的深衷。就前者而言，我曾写了一本“浅尝辄止”的习作，只有六万字；而傅先生在唐代科举与文学这个可持

续发展的问题上，却给学术界提交了一部近四十万字的十分详尽的答卷。就后者而言，《李德裕年谱》的编写，不仅对张尔田、陈寅恪两位大师的权威性著作有所商榷，对牛李党争这个历史上的重大问题提出了独特而又平实的看法，而且也为后来要写的文学编年史，做了某种程度的尝试。至于《唐诗论学丛稿》及《濡沫集》两书中的一些文字，可以证实傅先生在多年的学术跋涉中，不仅没有重复他人，并且也从来不重复自己，只是一直在踏踏实实地实现自己的追求。

任何一位学者都有所追求，而说到底，所追求的就是产生最好的成品。这可以用《礼记·大学》上的一句话来概括：“在止于至善。”朱熹《四书集注》释“至善”为“事理当然之极”。既称“当然之极”，那就是显然还有许多并非“当然”，或者未臻于“极”之处。学术研究必然要经过许多层次、许多过程，才能达到“至善”，而这正是古今中外学者的共同追求，傅先生的工作就是这种追求的典型表现。

文献学与文艺学是两种具有独特性质的学科，各有自己的对象、内容和方法。学者们在研究上往往各有偏重，各有取舍，因而也各有不同的成就。但这两种学科又可以互相支持，互相补充，合则双美，相得益彰；两者兼备，每每能更接近“事理当然之极”。傅先生早年曾对文献学下过极深的功夫，但从不放弃对文艺的摄取，对丹纳《艺术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都反复阅读，因而能够两者双修，运用自如。其收在《唐诗论学丛稿》中的一些论文，尤可见出这种特点。看了《唐五代文学编年史》的设想和样稿，更觉得傅先生已为文献学与文艺学的有机结合，找到了一个合适的载体，这是令人十分高兴的。

编年史是一种十分宏大宽容的历史载体，不论叙事、说理乃至写景、抒情，都可以在其中随意处理；而且又可以通过时间、空间的纽带将其熔于一炉。《左传》，特别是《资治通鉴》，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范例。是否可以说，从文学的角度看，我们对古代编年史的杰作学习得还是很不够的。我从傅先生所写的初唐三十年的初稿来看，似乎还有点拘束，缺乏《左传》《通鉴》中不时出现的波澜壮阔、淋漓尽致的大块文章。我们期待书中写杜甫、元结、韩愈时能出现《通鉴》

写淝水之战、李愬雪夜入蔡州那种好文章。编年史必须有极强的可读性，而不仅是翔实可信的记事簿。通过文献学与文艺学的高度有机的结合，又有文学编年史这样一种“旧邦新命”的载体，我相信傅先生及其学侣们这一创造性的尝试，必然会获得成功。虽不能说“止于至善”，但至少可以进一步逼近“事理当然之极”。

衰年八十有六，实已无力为文，勉成短序，以祝傅先生之好学不倦。

辽海出版社的领导同志每每不甚计较利润，出了一些好书。这次又毅然接受出版傅先生这部难有经济效益的书，实属可敬。于景祥同志尝从我问学，投身出版界后，仍热衷于学术，令我欣慰，附记于此。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

自序

傅璇琮

二百余万字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经过近十年的努力，终于完成，现由辽海出版社出版。这一项目是我与陶敏、李一飞、吴在庆、贾晋华几位学侣共同承担撰写的。现在，我们好像经过长途的跋涉，总算卸下了重担，轻松地吐一口气。来回顾这三百五六十年来作家群的起伏变化，如同观看一部长篇电视连续剧，不禁产生一种学术追求上的欣慰之感与学术合作中的互勉之情。

关于《唐五代文学编年史》的编撰体例，是我于1987—1988年间应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之邀，与该校李珍华教授共同进行王昌龄研究时起草的。1988年5月回国后，我即与湖南湘潭师范学院中文系陶敏先生，福建厦门大学中文系吴在庆、贾晋华先生磋商，建议共同从事于这一项目。他们几位，自80年代以来，在唐代文学研究上，工夫扎实，学识丰富，并与我一起做过合作研究。由我倡议发起的《唐才子传校笺》，吴在庆先生担任第九卷晚唐部分，贾晋华先生担任第十卷五代部分，陶敏先生则后来与复旦大学中文系陈尚君先生一起做整个《校笺》的补正，即于1995年出版的《唐才子传校笺》第五册。后来由我主编并在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唐诗研究集成”系列丛书，其中有一部九十五万字的《全唐诗人名考证》就是陶敏撰写的，我应邀为此书作序，对陶敏在唐代诗人事迹考证与文献研究的精细、开创之功，甚表钦佩。吴在庆则自80年代中期以来集中于晚唐文学的探索，出版了《杜牧论稿》《唐五代文史丛考》两书。晚唐作家作品情况十分复杂，材料真伪难辨，吴在庆这两部书所做的辨析之功，已为学界所首肯。贾晋华最初作《皎然年谱》，又撰《大历年浙西联唱：

〈吴兴集〉考论》等专论，与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赵昌平先生分别对肃、代时期吴中诗派作了深入地探索，进一步拓展了唐代诗人群体与地域的研究。在课题进行过程中，陶敏又约湘潭师范学院中文系李一飞先生一起做中唐部分编年。一飞先生为人踏实，他所写的文章虽然不太多，但其求实求精之风使人有深刻的印象。这几位友人在学问上多有胜我之处，我们也有共同的治学路数，因此，相互合作做这一规模较大的课题，我感到是可以对学术界负责的。

关于文学编年史，过去我曾有几篇文章谈到过，这里拟将这些论点贯串起来，以便于读者进行综合审察。

我于1978年完成《唐代诗人丛考》后，曾写有一篇《前言》，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现在的一些文学史著作的体例，对于叙述复杂情况的文学发展，似乎也有很大的局限。我们的一些文学史著作，包括某些断代文学史，史的叙述是很不够的，而是像一个个作家评传、作品评论的汇编。为什么我们不能以某一发展阶段为单元，叙述这一时期的经济和政治，这一时期的群众生活和风俗特点呢？为什么我们不能这样来叙述，在哪几年中，有哪些作家离开了人世，或离开了文坛，而又有哪年轻的作家兴起；在哪几年中，这一作家在做什么，那一作家又在做什么，他们有哪些交往，这些交往对当时及后来的文坛具有哪些影响；在哪一年或哪几年中，创作的收获特别丰硕，而在另一些年中，文学创作又是那样的枯槁和停顿，这些又都是因为什么？”

我的这一想法，是受法国19世纪文艺理论家丹纳《艺术哲学》启发的。60年代初，我读傅雷先生的中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当时感到极为新鲜，很有吸引力：

艺术家本身，连同他所产生的全部作品，也不是孤立的。有一个包括艺术家在内的总体，比艺术家更广大，就是他所隶属的同时同地的艺术宗派或艺术家家族。例如莎士比亚，初看似乎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奇迹，从别个星球上来的陨石，但在他的周围，我们发现十来个优秀的剧作家……在画家方面，卢本斯好像也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人物，前无师承，后无来者。但只要到比利时去参观根特、布鲁塞尔、尔鲁日、盎凡尔斯各地的教堂，就发觉有整批的画家才具都和卢

本斯相仿。……到了今日，他们同时代的大宗师的荣名似乎把他们淹没了；但要了解那位大师，仍然需要把这些有才能的作家集中在他的周围，因为他只是其中最高的一根枝条，只是这个艺术家庭中最显赫的一个代表。（第一章《艺术品的本质》）

我觉得，研究文学确实应从文学艺术的整体出发，所谓整体，包括文学作为独立的实体的存在，还应包括不同流派、不同地区可能互相排斥而实际又互相渗透的作家群，以及作家所受社会生活和时代思潮的影响。这样做，就会牵涉到总的研究观念的改变。但具体如何着手呢？我后来想到了编年史。我觉得文学编年史将对整体研究起一种流动观照和综合思考的作用。这也是对于长时期以来文学史著作体例所感到的一种不足。当然，文学史著作有它自己要解决的任务，它不能完全为文学编年史所代替，两者可以并存，而当前的情况下，建立编年史的研究则应引起学界的注意，它确实有其他文学通史、断代史、文体史所不能代替的特点与优势。

我的这一想法，也是受“四人帮”垮台后我国当代文学发展的现实之启示。可能当时书籍出版还没有现在这么繁杂，使人目不暇接；也可能80年代我个人的时间还较充裕，因此有余闲也有兴趣阅读70年代末以来的文学新作。当时就从当代文学的实际想到古代文学史的写作。我觉得，我们写当代文学史，如果还是像老样子，一个作家写完了再写另一个作家，一个个排着队来写，肯定会把丰富多彩、生机勃勃的当代文学弄得暗淡漠然，使人感受不到蕴含于作品中的那种强烈的时代精神和当代意识。如果我们逐年地作综合的记录，把政治发展、经济改革、人们思想情绪的变化、作家们复杂多样的经历及其创作活动，作总体、流动的考察，就会清晰地看出新时期文学在这十来年中前进的步伐。唐代文学也是如此，初唐文学将近一百年，虽有进展，但由于种种政治、社会原因，进展缓慢。盛唐开始，只不过十年光景，突然像火山爆发那样发出那么多诗的熔岩；而盛唐的高潮过后，又有一个回顾、思索的曲折时期，然后又产生贞元、元和时以古文运动和韩、白两大诗派为标志的另一高潮。这些，从我们现在提供的较为详确的编年史中会看得很清楚。80年代时曾出版过陆侃如先生的旧著《中古文学系年》，虽然还有可以改进之处，但毕竟给研究者提供

一种思索上的选择。我们如果分段进行唐代文学的编年，把唐朝的文化政策、作家的活动（如生卒、历官、漫游等）、重要作品的产生、作家间的交往、文学上重要问题的争论，以及与文学邻近的艺术样式如音乐、舞蹈、绘画以及印刷等门类的发展，扩而大之如宗教活动、社会风尚等等，择取有代表性的资料，一年一年编排，就会看到文学上的“立体交叉”的生动情景，这也必将引出原先意想不到的新的研究课题。

当然，我们也应看到，这项工作的难度是很大的。首先你得把唐五代数百位的作家行踪搞清楚。一定要有作家事迹研究的基础，才能再加概括和综合，编年史也才有符合实际的内容。其次，还要把各个作家创作的诗文时间作确切的系年，把作家间的交往作对应的考察。这无异于先要替一个个作家编写出个人年谱，再要把这众多的个人年谱汇总成作家群的活动记录，更不要说有些作品的真伪，有些作家生平记载的不确，需要重新予以辨析。这中间，我们当然可以吸取已有的成果，但不少是要从头做起的。这就需要沉潜于书斋，超然于世事，有一种学术奉献的心愿与知难而进的毅力。

前面说过，我们的体例是把众多的作家活动，包括其仕历、创作、交友等等，一年一年地加以排列，而我们还不仅限于以年为单元，每一年还再分为正月、二月等等，按月排列，类似于《资治通鉴》的体裁。这样做，确如唐代史学理论家刘知几所说：“虽燕、赵万里，而于径寸之内，犬牙可接”（《史通·外篇·杂说上》）。清代顾炎武《日知录·作史不立表志》中曾引述朱鹤龄一段话，强调史书立表的重要，说“年经月纬，一览瞭如”。这种方式，首先是把中国东西南北不同地区作家的不同活动，放在同一个时间环境中，然后又把这一文学整体，按时间流程，一年一年、一月一月地往前推移，好似电视屏幕上，有些图景消失了，有些出现了，使人容易看到当时文学活动的原貌和实景。

这里附带作一说明，五代时，除了北方中原地区先后出现的梁、唐、晋、汉、周以外，当时东南有吴、南唐、吴越、闽，中南地区有荆、楚、南汉，西南有蜀（前蜀、后蜀），各自立国。每一地区各有作家和文学活动，这些作家有时也往来于不同地区。为便于编撰，也为便于读者了解不同地区的实际状况，我们于一年之下，以政权行政

区为单元，再按时间顺序叙述。这样做，既可从中了解不同政权范围内的作家活动，也可从大的范围内宏观观察这五代十国的文学进展全局。

另外，我们此书有别于史书的编年史（如《左传》《通鉴》等）体例，即不采取通贯叙述的方式，而采取一种纲和目互见互联的办法，先用概括的语句叙述一件事，作为纲；然后引用有关材料，注明出处，表示言必有据，同时还作若干补充，使事件经过有较为丰富的具体内容。因此，严格说来，我们这样做还只是一种“长编”，还未能如程千帆先生序言中所倡导的《通鉴》淝水之战、淮西之战那样的笔法。但我们相信，有心者必可利用本书的资源（或云能源），作出富有才情的唐代文学流程图景，这将使这一代文学更能吸引人去钻研、探讨。

本书分初盛唐卷、中唐卷、晚唐卷、五代卷。初唐由于材料相对来说不太多，故与盛唐合为一卷。盛唐与中唐，中唐与晚唐，年代如何划分，目前还有不同说法。我们则大致结合历史与文学的情况加以划分。安史之乱起，肃宗、代宗时，李白、杜甫虽还在人世，但总不能说这时的社会还处于盛世。因此，我们将初盛唐卷的下限放在天宝十四载（755）安禄山起兵时，中唐卷则起始于天宝十五载也就是肃宗至德元载（756）安史之乱在北方全面展延时；中、晚唐则更不容易在哪一年作确切的切割，只能作大致的划分，即中唐卷的下限在敬宗宝历二年（826），晚唐卷则始于文宗大和元年（827）；晚唐卷止于唐末，即哀帝天祐三年（906）；五代卷起始于朱温代唐立梁的开平元年（907）。赵匡胤于公元960年代周立宋，是为宋太祖，但那时全国还未统一，特别是在这之后南唐尚有著名词学大家李煜还在进行创作活动。按理说，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可以在960年结束的，在这之后，从整体上说，即开始宋代文学史，但目前宋代文学编年史还未编就，因此，我们考虑五代十国的特点，把时间延至978年，即吴越最后献土为止；而960至978年间只记南方文学情况，不记北方中原宋朝范围内的作家活动。另外，有些涉及具体文字处理的，如某些碑传、墓志铭，篇名全称较长，为节省文字，我们适当地使用简称，这就不在这里一一细述了。

前面说过，作这样一种编年史，史料上辨析的难度是很大的。举凡作家的生年、卒年，活动经历，作品创作年月，有些不可考，有些

则过去记述有误。我们是尽力作一定梳理的，但难免有疏漏之处。我们诚恳地希望唐代文学研究同行和广大读者给我们以指正和补充。我们希望过一段时间对本书作一次全面的修订和补正，使它逐步成为一部信史，以作为同行和读者案头必备之书，这确实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使我感到欣慰的是，这一文学编年史的设想，已逐步得到学术界友人的认同和支持。苏州大学文学院潘树广教授在最近出版的《古代文学研究导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中，还特别提到：“傅璇琮倡导的‘文学编年史的研究’更为全面，从最阔大的视野考察一时代社会生活对文学的影响。”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赵逵夫教授得到信息后，给我写信，说已安排三个博士研究生，一起作先秦一段的文学编年史，这就类似于目前史学界正在进行的夏商周工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曹道衡研究员也已着手做秦汉魏晋南北朝隋文学编年史；唐以后，自宋至清，出版社与有关学者也在协商中，大致也已有眉目。如果我们能落实这一设想，就会有一部从先秦一直到清王朝结束（1911），时间长达数千年的文学编年通史，人们可以一年一年地看到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具体历程，这将是我们的文学史研究规模宏大的基础工程。

南京大学程千帆先生应我们晚辈之请，特为本书作序，这是对我们治学的一种激励。就我个人来说，近二十年来，在唐代文学研究上之所以有一点业绩，都是在程先生指导、鼓励下取得的。程先生序中对我个人的赞誉，我实是愧不敢当。我曾不止一次说过，我最大的心愿是为我们学界做一些实事，而我最大的收获则是不少师友对我的信知。

我们要感谢辽海出版社的领导能下这样的决心，不计经济负担，来出版这部二百余万字的学术著作。责任编辑于景祥同志曾是程千帆先生的研究生，深知学术甘苦，经历几年的编辑生涯，又备悉出版过程中的编校艰辛。没有辽海出版社领导的大力支持，没有于景祥同志的切实相助，这部书是不可能短期内顺利面世的。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

编撰说明

傅璇琮

上世纪90年代，我与深有挚情的陶敏、李一飞、吴在庆、贾晋华几位学侣深切合作，历近十年，终于完成这部《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并于1998年12月由辽海出版社出版。没有想到此书刚出版，就于1999年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稍后，又有著名学者、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董乃斌先生特以《论文学史范型的新变》为题写一书评（刊于《文学遗产》2000年第3期）。我确有深获学术信知的欣慰之情。

董乃斌先生赞誉此书“形成一幅具有‘立体交叉’效果的唐五代文学发展演变的活动图卷”，因而“这部文学史内容的异常丰富性”，“是一部原创性、填补空白的作品”。后复旦大学中文系黄霖教授主编的《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东方出版社，2006.1），其“总论卷”下编第十三章“多样化、个性化的《中国文学史》编写”，也特引用我的一段话：“研究文学应从文学艺术的整体出发，而文学编年史则可能会比较好地解决整体研究的问题”（《文学编年史的设想》，《江海学刊》1997年第3期）。黄霖教授在该章论述中将我们的这部《唐五代文学编年史》与曹道衡、刘跃进先生的《南北朝文学编年史》并称，谓两部书“材料丰富，考辨详实”，遂进一步评述：“他们在史料的考辨、辑录、梳理上做了坚实的工作，并通过史料排列，阐发了文学史上一些隐而未明的文学现象，为文学史研究提供更为丰富、更为真实的历史原貌”。

不过我在《唐五代文学编年史》的序言中曾提及，我们对作家的生年、卒年、活动经历及文人交往、作品创作年月，等等，于史料尽

量辑集、梳理，但难免有疏漏之处。于是又特表示：“我们诚恳地希望唐代文学研究同行和广大读者给我们以指正和补充。我们希望过一段时间对本书作一次全面的修订和补正，使它逐步成为一部信史，以作为同行和读者案头必备之书，这确实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前述的董乃斌先生书评，确充分肯定此书编撰特点，“一是突出资料性，二是强调实证性”，“在资料的丰富和实证的严谨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非常突出”，但于文末仍提出，有些有问题、有争议的史料，有应记载而未记，行文有疏漏，“此等虽皆小疵，然为修订留下了余地”。此后确也有学者提出本书疏漏的，如朱玉麒《唐五代文学编年史》书评（《唐研究》），周相录《〈唐五代文学编年史〉有关元稹事迹的辩证》（《中华文史论丛》第78辑），顾建国《〈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张九龄个案补正》（《唐都学刊》2001年第1期）等。再加上我们近十年来来自阅自核所发现的问题，确督促我们认真进行一次修订，这也是我们自己不能回避的责任。

此次修订，大致可分为订正错误和补充史实两类。据估计，修订有好几百处，我们确有自信，向学界提供质量较有保证的重印修订本。限于篇幅，不能具列事例，乃稍举有代表性的例子，谨供读者参阅。

文字错讹者，如《晚唐卷》原第5页“四月”下“郑浣”，原第89页倒数第3行“萧浣”，“浣”均应改为“澣”。又如该卷原第166页倒数第4行提及《娱书堂诗话》卷上，此“卷上”应改为“卷下”。原第602页倒数第5行提及秦韬玉相传为“咸通十哲”之一，此“咸通”应为“芳林”。原第972页倒数第2行谓《全唐文》卷八二〇载吴融文四篇，经核查应为十六篇。卷数之误者如原第31页“二月”条下第3行“见徐松《登科记考》卷二一”，此应为卷二〇。原第263页“三月”部分第4行“《通鉴》卷二三八”，应为卷二四八。类似者其他卷亦有，如《中唐卷》原第434页倒数第7行提及“《全唐文》卷二七四载叔伦”一诗，此“载”为“戴”之误。

我们这次所作，较有学术性的，为据近十年来的研究成果，对记事加以补充或调整。如作家作品研究，有熊飞先生的《张九龄集校注》（中华书局），我们现在关于张九龄的条目，即充分参考熊飞先生

所作。又如佛教典籍《历代法宝记》，我们这次即参据其材料，于《中唐卷》大历元年十月增补杜鸿渐条，记杜鸿渐以副元帅、黄门侍郎任政于四川成都府，邀约著名文人杨炎、杜亚、岑参等会见白崖山无住禅师，可见当时地方长官崇信佛教及幕中文士交往情况，可参见当时佛教风气。

最重要的则是新史料，特别是大批重要的唐代文学家墓志的发现。近年，吴钢编《全唐文补遗》十册（包括《千唐志斋新藏专辑》一册）、余华青等《陕西碑石精华》、赵君平等《河洛墓刻拾零》、乔栋等《洛阳新获墓志续编》、杨作龙等《洛阳新出土墓志释录》等均收入了大量新出土墓志。此外，唐文学家墓志或文学家所撰墓志零星见于报纸杂志者亦复不少，在网络中还可发现一些珍贵的墓志。

新出土墓志之所以珍贵，首先因为它们的志主多是唐代文学中的重要人物，旧史无传或虽有传而语焉不详的。即以《全唐文补遗》而言，其中所收就有许景先、张锡、郑虔、苑咸、郭湜、刘复、崔备、徐放、裴夷直等文学家墓志，有高适父高崇文、鲍防妻萧氏等诗人直系亲属墓志。散见者有韦应物墓志（《文汇报》2007年11月4日），李益墓志（《文学遗产》2009年第5期）、姚合墓志（《书法丛刊》2009年第1期）等。

其次，新出墓志往往是一个家族的多方墓志同时出土。如卢纶家族就先后出土了纶父卢之翰、母韦氏、弟卢绶、绶妻张氏的墓志；韦应物除其本人墓志外，还出土了其妻元萍、子韦庆复、媳裴棣墓志；皇甫曙家族出土了其父皇甫澈、姑皇甫氏（杜洵妻）、弟皇甫映、子皇甫燠、皇甫炜、媳白氏的墓志。这无疑可以提供更为丰富翔实的史料。

新出墓志解决了《编年史》中许多悬而未决，或决而不当的问题。如中唐著名诗人卢纶、李益之生年，《编年史》原据卢纶“八岁始读书，四方遂有兵”（《纶与吉侍郎中孚……风尘追游向三十载……》）的诗句及李益《从军诗序》“君虞长始八岁，燕戎乱华”语，推定纶、益均天宝七载（748）生。但现在卢之翰撰其妻《韦氏志》，韦氏天宝元年（742）与卢之翰结婚，天宝四载（745）三月去